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性超越

李琦, 亓光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 资本主义文化给后发国家带来了文化同质化、价值迷失及文化主体弱化等现代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体性—普适性—虚无性”进行整体性批判的基础上, 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现实路径, 即强化文化主体性、文化公共性以及坚持“尚和合”的文化伦理观。由此, 不仅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指导, 还为解决全球文化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形态; 文化主体性;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5-0013-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5.002

The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f the Cultural Forms of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towards the Culture Logic of Capitalism

Li Qi, Qi Gua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forms of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marks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apitalist culture has brought th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rn problems, such as cultural homogeneity, loss of values, and weakening of cultural subjects. Based on a holistic critique on the "subjectivity-universality-nihilism" of capitalist culture,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provides a realistic path to transcend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culture, that is, to strengthen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publicity, and to adhere to the cultural ethic of "harmony",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guidance for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offers a Chinese mode tha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global cultural crisis.

Keywords: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cultural form;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culture logic of capitalism

现代化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内在地推动了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哲学变革。这一变革促使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 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交织的多元文化样态, 并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塑造了社会的发展轨迹, 影响着各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 资本主义现

收稿日期: 2024-05-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KS064)

作者简介: 李琦(1997—),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现代文明;

亓光(1983—),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研究。

代化忽视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用资本主义文化取代了全球文化多元性,并以资本逻辑侵蚀了人的主体性,错误地将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视为普遍性,导致文化逐渐失去作为“人性之圆”的主体性原则,转而推崇物质价值。这种趋势带来的“普适性”和“虚无性”倾向正侵蚀着后发国家的文化核心,使文化问题成为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并未简单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实现了人本逻辑与现代化逻辑的辩证统一,展现了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解决了由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性超越,为全球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价值指导。

一、反思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带来的现代性难题

在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给后发国家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资本主义通过隐性与显性、刚性与柔性的手段,如话语体系和权力机制,造成了全球文化同质化现象,侵蚀了他国文化自主性,威胁他国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一)场域变革:多元现代性与文化同质化的时空悖逆

普遍现代化、多元现代性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框架,其不仅在宏观层面映射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还在个体层面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多方面互动,共同构建起推动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为各国现代化注入了活力。然而,在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文化理念,企图构建一个高度统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这种做法导致全球范围内多元现代性与文化同质化之间的矛

盾,形成了一种时空悖论。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结果,两者同频共振: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历史性展开,现代性是此种历史性展开作用于“共同体”的精神实质,隶属于国家的文化内核。但西方国家在全球拓印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方面,将具有先发性和发达性的现代化体制推广至后发国家,试图建构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以理性主义作为文化扩张之先手,谋求世界文明新格局,即哈贝马斯所言的“现代性方案”^[1]。同时,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愈发强化了资本主义文化这种超越或忽略空间主权的倾向,从而衍生了支配甚至虚无化后发国家精神质料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此过程中,为不断扩大有利于资本畅通运行的世界工厂,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以特定的“游戏规则”——物质资本、制度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权重及分配比率——影响、规范甚至支配后发国家的空间定位及关系构型,制造了以模糊共同体边界、主权边界、融合发展边界为目的的世界性文化叙事体系。质言之,一种“被放大的民族国家的文化”^[2]以隐匿性、灵活性和物役性方式取代多元文化,以“同一”代替“统一”,以“冲突”代替“和合”,以“文明优越论”代替“文明多元论”,从而驱使结构性资本完成“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3]。资本主义文化通过强调物质发展逻辑,导致全球文化同质化,忽视了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这种同质化趋势不仅减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还使得后发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丧失了主体性,只能被资本法则重新塑造,发展动力逐步减小。由此,后发国家面临着发展与主权、文化主体性与虚无性之间的价值冲突。

然而,现代化的推进不应该被视为对某一既定模式的机械模仿或简单套用,而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4],它要求将分

散的、联系薄弱的地方性社会整合为统一的现代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从同质到异质并存的转变,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逐渐实现了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多元’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更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5]文化作为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其主体性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特征。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若盲目追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可能会遭遇这种模式带来的普遍挑战。因此,需要深入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单一性、普适性、规范性和主体性,并正确理解普遍现代化与多元现代性的发展态势。因而,在资本主义文化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如何巩固本国文化主体性,避免文化同质化问题,成为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时代性挑战。

(二)价值迷失:个人主义嵌套个体化的逻辑混淆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自由理性、推崇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其普适性、排他性和扩张性在全球确立了文明等级。资本主义文化模糊了个人主义与个体化的界限,导致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混淆了两者的区别,造成了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对立,陷入了资本主义的自我中心和非理性价值观念。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推动西方社会实现了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主体性转变,个人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不仅作为自然实体存在,而且成为现代国家、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的基石。一种抽象自由理念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方面,个人主义指“人类被先天性地赋予自主性和自我决定的能力,独立的个体能够把握其生活的全部,能够从自身内部驱动、更新其行动能力”^[6],这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先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平等和现实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得个体可以自由地进行利己活动,并始

终与他者处在对立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普遍规则的制约。为了接近世界运作的真理并增强个人的自由度和控制力,个体必须通过“理性计算”来适应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个性被迫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调整。但是,由于“理性计算”无法完全揭示世界的真理性、无限性和客观性,个体最终可能会在无止境的利益计算中丧失道德规范,转向个人至上的“贪婪攫取”,彻底与物的扩张法则契合,从本质上来看“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7]。

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在心态和价值观上体现为个人主义。这一现象源于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结构的细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全面转型。这些变革打破了传统家庭和宗族对个体的强烈约束,使个体从既定的社会角色和规范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个体从过去被动接受共同体决策的“被决”状态,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具有自我决定权的“自决”者。

同时,在个体化进程中,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后发国家在社会与道德层面的某些真空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资本主义文化趁机通过经济改革、政治宣传和媒体传播等途径,将具有扩张性质的个人主义植入个体化社会之中。这种做法不仅模糊了个人主义与个体化社会之间的根本界限,还人为地制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影响着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甚至威胁到国家价值体系的稳定性。然而,个体化趋势的普遍性并不等同于表现形式的一致性。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展现出独特的个体化特征。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为了强调其文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并赋予其一种普适性和扩张性的使命。当这种个人主义与现代化国家的个体化相混淆时,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显现。

(三)主体虚显:共识性与整合性的力量弱化

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不只限于地理范围,还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影响着后发国家成员的心理和意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文化通过不断强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观念,塑造一种线性的等级体系。资本主义文化自诩为普遍理性的代表,将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理和普遍适用的思想体系。

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以话语为基础载体。一般来讲,“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而后在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的研究中,人们逐渐发现语言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社会实践相交织,并经由知识化、概念化和实践化等环节形成了体系化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是国家,本应在国家本土的发展环境和既定规则下运行,以此稳固权力。但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旨在用其意识形态解释、规范和批判后发国家的社会现象和主体认知,进而在“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同质性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固化—社会权力定型”中物化意识形态,威胁他国主权和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使资本逻辑变成统筹现代社会形态和制度的总体性存在。

全球化的发展扩大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普适性场域,使其得以在本土和全球的双重场域中进行社会活动,构建起全球性的“语言游戏”场。资本主义文化利用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制度资本,在“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中进行话语规则的较量,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等级、鸿沟和信息不对称,引发了冲突与斗争。这种斗争具有隐匿性和霸权性,资本主义文化通过文化资本掩盖其物质资本和制度资本,在“他者”领域内“复制粘贴”其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逻辑,从而重构日常生活场域的话语规则并以社会行动来固化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

这一过程致使后发国家的意识形态遭遇主体性危机,其社会共识和凝聚力不断被削弱,甚至出现文化虚无或文化依附现象,影响其权力秩序的稳定。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入侵,其目的是重构后发国家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整合机制,以实现其霸权统治。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整体性批判

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给后发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现代性挑战与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而且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文化扩张逻辑与文化多元现代性发展规律之间的根本冲突。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深入分析和解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不仅提出了新的文化形态,而且成功克服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固有的现代性问题,为全球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一)主体性批判:主客体颠倒的资本主义文化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强调物质的主导地位,通过“去传统化、去平等化、去主体化”的过程,物化人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物质化文化上升为构建生活经验和世界观的核心原则。相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坚持以人为本,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统一,重新定义了现代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文化中主体与客体颠倒的问题,确保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文化在现代化的演进中,导致主客体关系的根本颠倒。一是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文化通过去除人们受到的传统束缚,将人身依附的个体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从而确证了人的主体性。这一变革主要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基于平等的雇佣关系替代了封建社会的奴役制度,催生了自由劳动力和非依附性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创建了

更为复杂的社会分工和广泛的商品交换体系;理性、自由、民主的理念取代了愚昧和保守的封建思想,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架构。然而,在随后的商品关系扩张中,个体特性被逐渐消解,物质的存在及其影响力被无限放大。二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商品关系及其结构开始主导社会的物质流动,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对社会运行进行“理性计算”和机械式重组,这不仅削弱了人的主体性,还引发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即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理念的经济体系与其声称的民主和平等的政治理念在实践中的冲突。甚至,在商品化过程中,由于要契合财富增量理路,人的个体特性也被普遍化为“一种直观的态度”^[9],由此,商品关系也逐渐进入文化领域,发展出以商品拜物教为内核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并向着进一步普遍化和市场化的大众文化迈进。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去主体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文化彻底导致了主客体的颠倒,“物”替代“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跃迁式发展,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得以形成,其用消费、符号等构建的社会需要代替了个体需要,导致人失去了主体性和个体特性。至此,资本逻辑“把以往与之并存的一切非资本因素蚕食殆尽,其主要表现在对‘自然’和对人的‘潜意识’领域的最终占领”^[10],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所有层面在此过程中被大众化的文化商品所裹挟,彻底倒向利润增殖的同一性逻辑。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文化的痼疾就在于外在物质性变革对内在精神性变革的统摄,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呈现扭曲性发展,最终导致了主客体颠倒。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1],人既是现代化的建设者,也是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核心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有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思想观念、行

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单一逻辑,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创造具有历史意义的先进文化。在物质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依托先进的生产力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成果,这些文化成果由人民共创、共享。在精神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致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促进人们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融合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化经验,为其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二)普适性批判:隐匿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文化扩张

在主客体颠倒的前提下,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本性即为物的扩张逻辑。但“资本不仅是物,更体现出附着于物之上的社会关系”^[12]。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多元现实证伪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真理性 and 扩张的合法性,中国式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文化形态建构的基本原则是主体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其文化的广泛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其不仅在物质层面占据主导地位,还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了一种普遍性真理的假象,其终极目标是构建以资本为中心的同质化世界秩序。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通过建立全球性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为文化产业全球化创造条件。同时,科技创新作为文化生产力的驱动力,促成了多样化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这些产品或明显或隐晦地携带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二是资本主义文化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超越国家主权和地理空间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其影响力。在数字领域,资本主义文化通过数字媒介的“虚拟存在”来弥补现实世界中的“缺席”,以一种更为隐蔽且普遍的方式渗透进个体的生活实践

中。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文化在个体的认知主体与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一个中介——观念意识,使个体的认识过程受到一系列预设的实践、宗教、伦理和政治利益的影响,这可能导致个体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产生冲突。三是资本主义国家继续通过建构知识体系—认知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的知识空间框架,建立起资本主义文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联系,这就对后发国家设置了传统和现代、发达与不发达等“先在”和固化的思维定式。如此,资本主义文化就隐身于现代化理论中,而后发国家难以识别和抵抗隐匿的资本主义文化,并开始大范围、纵深性地接受和运用资本主义文化及其附加产品,继而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化和抽象化的过程,成为其现代化体系的附庸。

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文化具有普适性和真理性。在现代化的多元特性已被证明的现实背景下,文化形态的多元性也自然而然地呈现于世界现代化图景中。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主体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原则,构建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建构过程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3]。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机理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这些原理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这些文化以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化特征和价值体系。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中华文化自主性的基础上,更为积极主动地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并将其用于推动现代化进程。三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文化主

体性和现代性的辩证统一,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普适性逻辑,还自主构建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为全球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三) 虚无性批判:在重构日常生活中实现文化暴力

资本主义文化扩张的本质是霸权性的。在“人脑作为新的博弈场已经成为现实”^[14]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将带有其意识形态的知识、观念、文化等分解—重构为社会常识,使其合理、自然地重构后发国家的日常生活领域,隐蔽地将其意识形态入侵到“他者”的文化核心层,甚至被视为合理的社会发展过程。

资本主义文化通过虚无化手段对后发国家社会常识进行重构的过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对“他者”文化和历史进行虚无化处理。历史和文化是社会的根基,资本主义采用隐蔽和间接的方式歪曲后发国家的历史,并植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以此解构后发国家成员的基本认知,实现对“他者”历史文化层面的虚无化。二是通过重新评估知识体系来改变“他者”的认知习惯,进而塑造后发国家成员的认知结构。它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嵌入现代社会的知识更新过程中,逐渐渗透进后发国家成员的心理层面,取代其原有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三是利用算法技术过滤和筛选文化符号,使后发国家成员陷入“信息孤岛”,反复暴露于“回音室效应”之下,加深文化的同质化、隐蔽性和渗透力。当这些经过筛选的社会常识在后发国家成员心中扎根并逐渐扩展成网络结构之后,个体的思维模式和想象力便被这种长期持续的过程所塑造和限制。由此观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构建了一种隐秘而“自然”的认知机制,使后发国家成员深信其观念和逻辑是合理的,认为自己是在“真理”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这种认知的双向强化最

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的稳固的资本主义精神架构,能够持续地规范后发国家成员思想和行为,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扩张提供合法性辩护,并将其内化为正当的社会秩序。总体来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是一种以征服性、介入性和实践性为核心逻辑的文化侵略行为,旨在重构后发国家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整合机制,以实现其霸权统治的目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建设性的、共赢性的,而非入侵性的。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思想根基。一方面,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在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前提下汲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不是以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另一方面,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之完善提供了文化动力和原则指导,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使其在“激活—结合”的现代转型中获得自身生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此外,中国从不认同“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更不以“文明开化”之名行“文化霸权”之实,而是充分尊重各国文化多元性、个体性和自主性,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共识、化解冲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是文化形态之具体表现,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现实路径

资本主义文化曾推动了历史性的文明变革,但最终又走向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和扩张,削弱了文化多样性,减缓了文明发展的进程。相较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文化主体性、整合性和伦理性,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霸权观念,增强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全球文化繁

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突破知识论陷阱,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来巩固文化主体性

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之初,便构建并向世界推广了一套关于现代化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设定了框架,限制其在资本主义国家预设的轨道上进行思考与实践。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基于自身经验构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适范式,赋予其普遍性和可度量性,还建立了一个包含知识、话语和信念的连贯体系来主导现代化议题,使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理路变成了“对‘可见’内容的一种纯粹‘直观’”^[15],导致后发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难以进行深入反思和批判。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现代化模式的固有预设,即构建以文化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知识体系。从实践哲学视角来看,主体性是个体在社会实践中与社会关系互动而形成的主动性特征。在此框架下,文化主体性一方面体现为个体在文化创造、构建、传承和转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塑造了一个具有目标意向的复杂系统;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化对个体的规范作用,即促使个体在认知构建、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变中展现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全球文化领域中,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独立自主和创新开放,始终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努力方向。文化主体性依托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活场景和精神内核,强化了中华文化与全球文化的互动关系,并在辨析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中,实现自我定位和文化互动的同向发展。基于文化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在宏观层面塑造了实践主体的精神实质,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目标方向和实践策略,而且在知识论层面巩固和扩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利用中国的思想、知识和方法构建了现代化的话语和

叙事体系。这不仅向世界阐释了中国的观点、理论和立场,而且减少了中国对资本主义认识论的依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正如有学者所言,“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由不同的社会建构方式所建构的。这反过来意味着,意识的形式和意识的建构方式都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差异。因而,每一种社会形态都要求有它自己的认识论。”^[16]中国式现代化为他国提供了以社会历史认识论来正确认识现代化的基础维度,使其在文化自主觉醒、理性反思和科学审视中明晰本国现代化的真命题和真解答,从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文明形态。

(二)超越资本逻辑悖论,构建以公共性为内核的文化整合观

资本主义文化在表象上服务于人,实则物质增殖为核心,导致了多重发展悖论。一是它造成了财富的公共创造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二是资本的自我增殖需求与其依赖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导致阶级分化,引发资本与民众的冲突。三是在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实中,个体的公共意识逐渐与社会脱节。相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社会发展模式,它顺应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共在一共识—规范”系统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多主体、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和谐共存,强化了文化公共性,凝聚了广泛的文化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以“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共在”基础。“共在”是由现实的人的本质决定的,是凝聚和团结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前提;只有在承认“共在”的基础上,社会成员才能对各种关系、活动、现象及其性质作出科学解释和判断,形成平衡稳定的共同体关系。“两个结合”激活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生命力和生长性,并以此为总体价值观巩固了交互主体在共同体中的价值“共在”:其既以平等、公

平、公正的发展原则来确保价值“共在”的实体性基础,又在精神领域提炼精神标识,促使人们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奠定价值“共在”的精神基础。由此,在整体上稳固了共同体内部的个体与集体、多样与统一的平衡关系,为形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在“共在”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进一步强化了“共识”,形塑共同体意识、关系及制度。从价值导向来看,创造一种共识、共善的生活方式来实现自由发展的总体性目标,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追求。但“共识”并非自然生成的,多主体就意味着多样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共在”。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来推动各阶层、各群体的不同思想观念走向趋同和差异“共在”,从而实现精神力量的凝聚。从力量转化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推动具备普遍有效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意识的形成,如政治法律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等反映社会存在的上层建筑,以此构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文化规范功能,为社会公共性提供了保障。无论是“共在”还是“共识”、个体性还是公共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空间,都必须以一定的“规范”作为约束评价尺度,惟其如此,个人才能真正参与公共生活。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致力于以价值尺度和约束性规范来推动形式正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和结果正义的有机统一,使个人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规范性自由,在交互活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要实现文化的公共性功能,使其内聚于“共在一共识—规范”的社会系统中,推动共同体中自我与他者、他者与他者联结关系的强化和稳固,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力量。同时,文化的公共性功能并非国家机器意义上的纯粹工具理性,而是真正创造能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P199)}的真正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三)抵制文化霸权,坚持“尚和合”的文化伦理观

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这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然而,西方从原子论、神学到文化霸权,一直在追求统一的绝对理念。在社会实践中,资本主义国家倾向通过武力征服、意识形态渗透来主导“他者”的发展模式。因而,“打破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冲突,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17]。对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尚和合”的文化伦理观,尊重各国文化主权,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交流与互鉴。

中国式现代化秉承“尚和合”理念塑造文化发展的框架。“尚和合”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独特的精神特质和动力,成为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尚和合”理念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和实生物”,强调多元文化要素的有序互动是文明稳定发展的基础,避免陷入单一化和极权化的循环,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理性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中国始终提倡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文化场域,建构“由‘公平’对话走向文明‘互鉴’的叙事逻辑”^[18],坚持以对话协商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二是“和而不同”,提倡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基础上,建立尊重差异的对话平台,为现代文明的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文明演进之“道法”,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原则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倡导各国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合理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三是“和合共生”,旨在超越“自我—他者”的对立关系,构建一个具有开放性、主体性的文化发展共同体,实现不同文化主体的自由创造与和谐共存。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一种世界文化交流的新结构关系,促使各国文化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辩证统一,以此提升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认同感,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66-167.
- [2] 金惠敏.消费他者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6.
- [3] [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1.
- [4] [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28.
- [5] 项久雨,李念念.文化安全视域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0.
- [6] 杨君.个体化的社会想象:乌尔里希·贝克思想中的生活、政治与道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63.
- [7]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5.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 [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56.
- [10]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234.
- [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98.
- [12] 项久雨.现代性悖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6):43-48,204.
- [13]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
- [14] 丁剑.文化安全:风险的现实与现实的风险:基于北约国家“认知战”新动态的前沿考察[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01-109.
- [15] 林青.“形式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前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2):84-90.
- [16] [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00.
- [17] 喻丽果,赵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路探赜[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5-21.
- [18] 嵇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辨析、演进规律及世界意义[J/OL].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5):45-55[2024-07-12].